



基于公共健康视角的体育博彩社会责任研究

李海

摘要: 公共健康视角是未来博彩社会责任研究的一种趋势。该研究视角更多关注的是由博彩引发的“危害”，进而将博彩问题产生的责任从个人部分转移到了博彩运营商和政府身上，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来达到危害最小化的目的。该视角更多关注的是问题博彩现象，并且提出博彩公共健康理论的目标是宣传、预防和保护。该研究视角也存在研究较为复杂、收集数据及跟踪调查难度较大、预防措施缺乏有效验证等问题。

关键词: 体育博彩；公共健康；危害；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2)03-0008-06

Viewing the Social Obligation of Sports Gamb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ealth

LI Hai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ealth is a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on social obligation of sports gambling. The research puts more attention on the "harm" caused by the gambling. It shif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using gambling problems from individuals to gambling operators and government. It aims to minimize the harm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This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phenomena of problem gambling and the object of its gambling public health theory is promotion,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But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is study perspective. The study itself is complicated.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data and make track investigation. An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lack effective verification.

Key words: sports gambling; public health; harm; social obligation

目前国外文献中，提到博彩社会责任更多指的是博彩履行的彩民社会责任，而且往往将问题博彩作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对于问题博彩这种现象应该倡导从公共健康视角进行研究 (Korn et al., 2003; Korn & Shaffer, 1999; Messerlian et al., 2005)^[1-3]。公共健康框架类似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它逐渐突破了博彩是一种个人行为观点，更深入、更广泛地集中于社会上广泛的博彩现象；它不仅仅将问题集中在问题博彩上，它还强调问题博彩的预防和危害减少，它强调危害的最小化。公共健康方法探索决定博彩的生物学、行为学、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因素 (Korn, 2001)^[4]。它不仅解决问题博彩者面临的问题，还聚焦于提高遭受博彩影响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质量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0)^[5]。这一视角是通过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对博彩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博彩和相关疾病的分布情况以及在人从正常状态转为不正常状态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它借用了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式，描述了病源和宿主、媒介物、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见图1)。

从公共健康视角来看，博彩行为可被界定为一种连续统一体，即从没有博彩行为到健康的博彩行为再到有问题的博彩行为这样一个连续统一体。Korn (2001) 指出健康博彩指的是可以维持或者提高一个人幸福感的博彩活动^[6]。Korn等 (2003) 在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定义基础上对健康博彩和不健康博彩进行了如下界定：“健康博彩需要彩民对博彩的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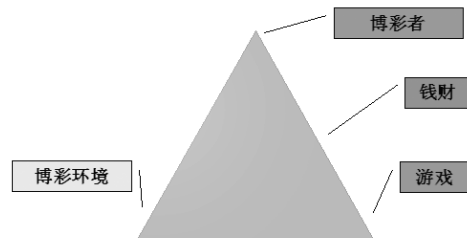


图1 问题博彩的决定性因素和控制
Figure 1 Decisive Factors and Control of the Problem gambling

胜概率做到知情选择，在低风险情况下愉快的博彩经历，以及合理的投注金额。反之，不健康的博彩是指各种级别的博彩问题。”而对“博彩问题”的定义是：“……反映各种连累、扰乱和损害个人、家庭以及职业追求，并导致不良后果的各种博彩行为”^[7]。图2从公共健康角度分析了博彩，其可能的结果以及不同层次的介入方案应当采取的时机。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危害最小化 (harm minimization) 或危害减少 (harm reduction)”和“责任博彩 (responsible gambling)”。下面就这两部分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

1 危害最小化

1.1 危害最小化内涵

危害最小化或减少危害的概念作为一种公共健康战略，

收稿日期：2012-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8CTY005)；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J51002)；上海市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S30801)

作者简介：李海，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体育博彩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赛事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图2 从公共健康角度看博彩及相关问题

Figure 2 Viewing Gambling and the Correlativ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ealth

原是拟作为一种限制不良健康后果普遍扩散的尝试，常与毒品有关。关于这个词在文献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但一种通常可行的解释是“减少危害的目的是减少滥用药物引起的人的健康、社会、经济损害（若是当事人主动选择，则不排除长期的禁欲行为）。减少危害讲求实效和人文主义，注重危害及重要事件【注1】。”

危害最小化最初用于20世纪80年代，限制肝炎在荷兰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间的传播，随之引起的艾滋病的蔓延使得这项战略的完善变得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危害最小化措施则旨在控制血液传播疾病的扩散，包括使用一次性针头计划、提供漂白套装和美沙酮维持治疗。这些措施使人们得以接触毒品成瘾者，为其提供教育、咨询，并使其获得治疗设施。

尽管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兴趣和争议，但是关于毒品、酒精、烟草的危害最小化计划已在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最近又在北美地区获得正式认可。减少危害或危害最小化的定义仍然没有在成瘾文献上或在从业人员中达成一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危害最小化的一些基础性原则已被应用于博彩行为研究领域。博彩行业和各国政府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引入了危害最小化和责任博彩措施以寻求利益相关群体的支持与帮助，而福利机构更是热衷于此。

1.2 危害最小化与博彩

从预防和控制的观点来看，控制药物滥用的公共健康管理经验为博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饮酒和博彩在成年人中都是合法的，并且被大量销售，受到高度管制。政府也从这两项产业中得到了大量的税收收入。他们都将自身定位为一种追求娱乐或休闲的产业。因此预防工作主要侧重于成年人的个人责任和对健康的选择。法律禁止未成年人饮酒和博彩，针对青少年的宣传则强调要理解同伴的压力，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学会拒绝的技能（Korn & Shaffer, 1999）^[8]。

由于酗酒和博彩，以及作为一种成瘾行为概念化的博彩之间的相似之处，博彩研究领域的专家建议，卫生当局应采取减少危害的战略，以减小博彩行为带来的损害个人、家庭和集体健康，及随之产生的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Korn, 2000）^[9]。

而公众对于问题博彩的看法是，推行博彩的政府同时也

具有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来承担责任，以减小博彩对社会造成的任何危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为一般公众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以完善健康博彩的准则（类似于应用水的低风险准则），一些创造性方法使博彩问题能够被及早的发现，同时，针对问题博彩者还制订了包括节制和禁欲在内的目标措施（Korn & Shaffer, 1999）^[10]。

从公共健康角度看，博彩产业发展的一套提高自身责任感的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它为整个社会，以及不同程度上的消费者保护提供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博彩观念，而不仅仅只是关注于问题博彩和病态博彩（Korn & Skinner, 2000）^[11]。

1.3 博彩危害最小化中的假设

危害最小化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与博彩相关的、或由博彩引起的有害后果，而不是全面禁止或完全避免博彩。有害后果不仅局限于问题博彩者，偶尔也存在于娱乐性博彩者中。因此，危害最小化意味着除了禁欲导向政策，人们有了另一种选择。它着重于减少所有博彩者因博彩引起的不良后果。

危害最小化策略的首要任务是使娱乐博彩的发展和干扰与尽量减少过度博彩产生的不利影响两者得到平衡。具体来说，目标是：首先保护和防止个人产生博彩问题。其次，通过提供相关的保护措施，防止继续失控或过度博彩；提供有效的治疗或康复服务两项措施帮助现有的问题博彩者。

Blaszczyński 和 Nower（2002）提出了若干危害最小化方案的内在基本假设：

- (1) 博彩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娱乐，并带来社会和经济利益；
- (2) 过度博彩致使相当比例的参与者、家庭成员和其他人员遭受重大损害；
- (3) 在社会成本和博彩带来的利益之间需要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
- (4) 安全程度上的博彩参与是有可能的；
- (5) 对于有博彩问题的人来说，完全禁止是一个可行但不一定必要的目标；
- (6) 对问题博彩者来说，控制参与度，回到安全程度内博彩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13]。

随后出现了3项基本策略（Marlatt, 1998）：

- (1) 人与人之间协作或与团队合作；
- (2) 改善环境；
- (3) 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变^[13]。

这就好比一个人学开车。驾驶是大多数人常会经历的一种高风险行为。避免开车虽然安全，但并不方便也不切实际。因此，有3种方法可以用来减少危害后果：① 对司机加强负责任的教育和培训；② 从环境角度制定减少危害的措施，包括汽车本身（如安全带、安全气囊等），和环境（如更安全的道路系统和改善道路状况）；③ 制定规范驾驶的法律和政策（如限制车速、血液酒精浓度限制）和惩处违法者（罚款、吊销驾照、被判入狱等）。

1.4 博彩危害最小化的策略

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可能的危害最小化提案，但其中许多并没有得到落实，或仅基于自愿的基础在个人管理决策中被引用。这就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出现零散、矛盾而分裂的计划。



然而, 这些建议性举措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博彩形式, 它们在管理和监督中也有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对娱乐性博彩者造成消极影响, 而对问题博彩者可能只有细微影响, 也可能表现出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虽然人们会被其表面价值吸引, 但几乎没有实证材料可以影响政策制定或支持现存倡议的有效性。

此外, 关于一个标准的危害最小化方案应包含哪些基本要素这一问题仍没有统一的意见。审议领域包括行为守则、员工培训、内部政策, 还有对问题博彩者的确定、处理和管理的流程等。

正如 Hing (1999) 所指出的, 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在游戏供应商的公开和透明合作间是一个障碍。但近年来, 博彩产业通过接受减少收入、保持行业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已经显示出真正的致力于游戏行为责任感建设^[14]。

回顾已用于博彩的许多出于自愿的合法建议性举措, 我们可以发现一项用于最大限度减小危害的三级策略方针已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得到实施。即, 初级预防是防止参与者出现博彩问题的策略; 二级预防是限制潜在问题的出现, 包括博彩开始后产生的影响; 三级预防是减缓现有问题的严重程度及预防复发的策略 (Blaszczynski, 2001)^[15]。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在这些具体的危害最小化措施中, 它明显缺少可信的研究数据支撑, 有时研究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例如, 以下观点普遍得到共识, 即如果博彩者真正了解了博彩的负面影响, 他们就不会过度沉溺于博彩。然而文献却对该问题研究呈现出 inconsistent 的情况。Schoemaker (1979) 发现, 与没有接受过数据培训的大学生相比, 接受过数据培训的大学生在博彩项目中更能作出较优的选择^[16]。然而, Gibson 等 (1997) 认为, 被明确要求评估某一运动队胜率的学生趋向于过高估计该队的实际胜率, 于是比没有被要求评估该队的学生下注更多^[17]。同样, Ferland 等 (2000) 认为, 相比不知道具体赔率的学生来说, 了解某场比赛可能性的学生下注更多^[18]。Steenbergh 等 (2004) 指出, 得到过明确的关于错误博彩警告的大学生获得了较多的知识, 但与没有接受过类似教育的大学生相比, 玩轮盘游戏的概率是一样的^[20]。与之相反, Floyd 等 (2006) 指出, 关于负面的博彩信息导致了大学生减少了用流动的现金参与电子的轮盘游戏^[21]。Williams 和 Connolly (2006) 为 198 名推荐的大学生上数据课, 教授理论知识并提供博彩相关实例, 而且在实验室中提供博彩游戏的亲身体验。6 个月之后, 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显示了较高的计算博彩赔率的能力和抵制博彩设施的能力。然而, 这种提升的知识和能力并没有让实际的博彩行为有所减少^[22]。

2 责任博彩

责任博彩也是公共健康研究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研究中它和“博彩业的社会责任”具有相同的含义。“责任博彩”在英文中主要可以用“responsible gambling”和“responsible gaming”这两个词汇来表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 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相同的, 一般指的是应用到从个人行为 and 态度到公共健康等一系列宽泛问题和政策的概念, 责任博彩实施的具体措施往往包含在一些政策文件中。

在责任博彩战略中, 还经常会提到一些与责任博彩相关的词汇, 如责任博彩的实践法规 (responsible gambling codes of practice), 主要指的是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颁布的与责任博彩相关的法规, 如美国博彩产业协会 (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 简称 AGA)^[22] 的责任博彩实施法规 (The 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Gaming) 和 IPART^[23] 的责任博彩实施法规等, AGA 的责任博彩实施法规对于它的成员公司的雇员、老顾客和公众, 对游戏场所的广告和市场营销等活动都规定了具体的实施原则。这些法规一般是自愿执行的, 往往是当地政府为有效管理博彩运营商同时显示出政府部门对大众责任博彩的一种承诺而颁布实施的。如在澳大利亚, 它的州政府因为控制管理着当地合法彩票市场, 所以在责任博彩的实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的许多州从 2000 年以后陆续颁布了责任博彩实践法规, 昆士兰州 2002 年颁布了该州的责任博彩实践法规等。博彩的责任条款 (responsible provision of gambling), 指的是责任博彩的实践法规中颁布的一些具体条款, 而博彩的责任实施 (responsible conduct of gambling), 则主要指的是针对这些责任博彩的相关条款而采取的一些实施过程。

当前主要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博彩发达国家的学者对责任博彩进行研究, 尤其是澳大利亚, 这可能和这些国家博彩业较发达从而导致更多问题出现有关, 尤其是已将博彩深深烙入社会文化范畴的澳大利亚, 故在博彩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中澳大利亚学者走在前列, 文献中更多体现出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成果。

2.1 责任博彩相关概念的内涵

在博彩的责任实施方面设计出适当的措施首先要求人们在一些主要相关概念上达成一致, 尤其是责任博彩、博彩的责任条款和问题博彩等这些关键概念。当前各国在界定责任博彩措施方面, 人们达成的一致非常有限, 甚至许多措施是在未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实施的。例如在澳大利亚, 没有任何与博彩相关的法律或规章界定这些术语, 甚至是那些特定的以危害最小化为目的的法规也是这样; 而且, 许多自愿的责任博彩政策和项目要么忽略了这些术语的准确含义, 要么前后严重不一致。这在表 1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责任博彩这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从表 1 可见一斑。责任博彩虽然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 然而大多数文献对它并没有进行准确的界定, 致使各类文献中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 (Hing & Buultjens, 2005)^[23]。责任博彩是一个易变的、动态的概念, 它往往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与博彩相关的法规和产业实践行为准则中, 然而却很少有关于这个术语具体含义的讨论 (McMillen et al., 2000)^[24]。Remmers (2002) 认为, 责任博彩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术语, 包括:

(1) 彩民保护信息, 例如游戏获胜的随机特征和过分博彩可能引起危害的警示语等信息;

(2) 减少问题博彩事故发生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年轻人接近博彩、对于限制老彩民饮酒的条款和控制博彩中的信用现象;

(3) 帮助问题彩民和他们家庭的项目, 包括咨询服务、自我排出计划和博彩工作人员的训练^[25]。

Michalea (2000) 将责任博彩定义为以一种旨在最小化



表1 澳大利亚责任博彩政策和项目中的主要概念
Table 1 Australia's Policy of Obligation Gambling and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Project

名称	概念
责任博彩	“每个人都根据其个人情况做出理性、合理的选择”(维多利亚博彩游戏产业, Victorian Gaming Machine Industry); “与博彩相关的潜在危害最小化, 人们在被告知决定的前提下参与博彩”(昆士兰州责任博彩咨询委员会, QLD Responsible Gambling Advisory Committee); “人们在自己意识范围内参与博彩及其他娱乐活动, 并且不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塔斯马尼亚娱乐场, Tasmanian casinos); “人们把参与博彩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它没有影响其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幸福生活”(澳大利亚娱乐和休闲集团, Australian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Group)。
问题博彩	“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危害, 并导致严重个人问题、财务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博彩行为”(星城娱乐场, Star City Casino); “博彩对人们生活的任何方面造成危害”(BetSafe 俱乐部集团, BetSafe Group of Clubs); “当博彩行为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 对博彩者本人、家人或朋友造成安全或幸福感的威胁, 甚至于负面影响扩大到更大的社区中”(昆士兰州责任博彩咨询委员会, QLD Responsible Gambling Advisory Committee)。
博彩的责任实施	“用以净化博彩环境, 以减少负面社会、财政和其他对公众、个人和家庭造成影响的项目及措施”(ACT 俱乐部, Clubs ACT); “为潜在的和现存的问题博彩者提供安全网络的政策、措施和步骤, 这将为所有的消费者、员工和管理者创造出责任博彩环境”(BetSafe 俱乐部集团, BetSafe Group of Clubs); “用能够最小化对个体博彩者、家人和社会造成潜在危害的方式来提供博彩服务”(星城娱乐场, Star City Casino); “一种在能使危害最小化, 并迎合社区期望的环境中管理博彩的方式”(新南威尔士州俱乐部, Clubs NSW); “博彩俱乐部产业及它的会员采取迎合更广大人群价值观和社区目标的决定及行为”(昆士兰州俱乐部, Clubs QLD); “以符合政府规章和社区要求, 并且力求将任何会导致问题博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程度的方式提供博彩服务”(新南威尔士州 TAB, NSW TAB); “提供责任博彩和寻求最小化与博彩相关危害的政策, 并提供博彩活动的责任条款。”(昆士兰州俱乐部, Clubs QLD); “博彩场所可以承认有些玩家会遇到不能自控的问题。因此在博彩场所中设有相应协助这些博彩者的项目”(塔斯马尼亚的产业集团实施准则, Tasmanian Industry Group Code of Practice)。

博彩对彩民和社区的危害为方式的博彩服务条款。责任博彩是一种预防性战略,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并且最大化地造福社区^[26]。

除了减少危害外, 也有学者认为责任博彩还应该包含知情选择, 它是支撑消费者保护的关键原则。例如 Dickerson (1998) 建议, 通过运用知情选择原则, 责任博彩需要确保博彩者至少: ① 被告知所有博彩形式的相关过程; ② 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 做出一个明智的决策; ③ 并不是在情绪激动和个人紧急关头的情况下做出博彩决定^[27]。

责任博彩也暗含着以社会负责任的形式来提供博彩活动, 它也是对社区关注和期望的一种反应。比如 Hing (2000) 认为, 博彩的责任条款意味着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以一种迎合社区(或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的形式来为社会提供博彩活动^[28]。

上述谈到的3项原则(危害最小化、告知选择和社会责任与反应)往往与责任博彩和博彩的责任条款联系密切。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昆士兰州责任博彩战略》中将责任博彩定义为: “责任博彩发生在规范的环境中, 与博彩有关的潜在危害能够最小化并且人们在参与博彩时可以做出知情的决策。责任博彩的产生可作为集体行动的结果, 并且由个人、社

区、博彩产业以及政府共享所有权, 是为了取得成果从而对社会负责并且对社区关注做出回应”。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责任博彩虽然是一个动态概念, 然而它的核心内容却是“危害”, 一方面如何做到减少危害从而对消费者起到保护作用, 这里面涉及到对彩民的信息告知, 保证彩民在获取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这是从彩民自身角度而言; 另一方面, 从更大的范畴如社区来讲, 责任博彩要做到对社区的危害降到最低, 同时要迎合社区的发展需求。

2.2 责任博彩实施法规目标与内容

除了在界定相关概念和原则上有所分歧外, 责任博彩实施法规面临的挑战是它究竟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和目标并且如何有效地执行, 尤其是这些责任博彩的实施法规往往是自愿执行和自我管理的。这也是各国学者在责任博彩研究领域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

因为问题博彩和责任博彩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如政府、博彩者、福利组织、司法机构、法律界、公共利益团体、社区和博彩运营商等。这其中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从自身角度出发都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和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责任博彩实施法规目标时, 就面临着应该倡导谁的观点



的难题。

关于谁的利益更应该体现在博彩的责任条款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也阻碍了责任博彩实践法规中的目标确定。通过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责任博彩实践法规的汇总,发现这些法规包含如下一些目标:预防问题博彩,最小化问题博彩现象,治疗或者帮助有问题的博彩者,减少问题博彩者的消费,减少由博彩引发的危害,执行一些措施来宣传责任博彩,对消费者进行博彩风险方面的教育,从负责任的角度来保护产业,增加产业的信誉或者产业显示出良好的公司公民形象等。Hing (2003) 从澳大利亚 30 多个责任博彩政策与法规中总结出来了各项法规的目标,从中可以看出各类目标之间的差距^[29]。

- (1) 危害最小化;
- (2) 遵守法律;
- (3) 公平交易;
- (4) 消费者信息;
- (5) 责任市场营销;
- (6) 消费者保护;
- (7) 保护老顾客隐私;
- (8) 迎合社区(或社会)标准;
- (9) 以负责、诚实、正直的态度经营博彩;
- (10) 提供促使老顾客进行责任博彩的环境;
- (11) 与问题博彩支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社区(或社会)机构合作;
- (12) 加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 (13) 提升相关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 (14) 提升博彩的休闲、娱乐功能;
- (15) 对员工以博彩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培训;
- (16) 履行现行的政策和准则所倡导的价值观。

Doherty (1999) 在比较了澳大利亚各州的责任博彩实施法规和其他行业的实施法规后认为,责任博彩法规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 (1) 明确的产业承诺——有明确的目标、期望和基本规则;
- (2) 包括第一线的员工——需要有恰当的、定期的培训为博彩部门提供合格的劳动力;
- (3) 对于发展和执行法规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制度基础——包括执行和遵守;
- (4) 对于自愿遵守应该有明确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如果不遵守的话应该有明确的惩罚措施;
- (5) 社区信心——通过发展、实施中的开放过程和操作中的透明度来获得;
- (6) 定期的提供信息——是关于法规如何运行和遵守;
- (7) 广泛的宣传——既对法规本身也要对它的投诉措施进行宣传;
- (8) 定期的评估——以确保法规迎合社区的期望^[30]。

Hing (2000) 在 Carroll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博彩运营商应该在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领域履行责任。在这些领域,责任博彩实践应该通过主要危害最小化(预防性措施)、次要危害最小化(早期干预)、第三级危害最小化(那些受到影响人的治疗)、公平交易(产品信息和负责任的市场营销)、消费者保护(抱怨机制和老顾客私人信息

的保护)、对问题博彩和责任博彩事业给予金融和实物类的无偿援助等原则使之巩固加强^[31]。

尽管博彩运营商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产业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分歧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的目标和博彩运营商追求的目标两者截然不同。这一点可以从 Hing (2000) 的研究中看出,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博彩俱乐部管理者和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对责任博彩实践内容和原则观点的比较发现,俱乐部管理者在博彩运营中将经济责任放在第一位,然后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最后是慈善责任;而政府、社区服务组织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则倡导要全面履行各项责任。Hing (2003) 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分析后提出,博彩的责任条款可以界定为:“在管理企业的博彩社会影响方面,博彩活动应以下列方式进行操作,即该活动在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和社会理想的结果等方面迎合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期望”^[32]。这个定义澄清了博彩责任条款的目标,作为管理博彩运营商的社会影响和完成这个目的的认知,即要求企业将注意力放在执行博彩活动的相关原则、过程和结果上。而且,这个定义强调了目标最终完成的情况及在博彩责任条款情况下企业社会绩效由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来判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各国责任博彩实践法规的具体实施内容和研究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主要体现在各利益相关方会从各自角度出发设定目标,这一方面和责任博彩内涵没有取得各方共识有关,另一方面和利益相关群体在各国博彩市场上的地位不同也有关。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博彩责任实践法规更多还要体现出博彩运营商以外各利益相关群体的观点,这也体现出博彩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

3 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共健康视角研究博彩更多的还是关注由博彩引发的“危害”,进而将博彩问题产生的责任从仅归咎于个人,部分转移到了博彩运营商和政府身上,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来达到危害最小化的目的。该视角更多关注的是问题博彩现象,并且提出博彩公共健康理论的目标:一是宣传,针对博彩活动和博彩者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告知以协调他们的博彩行为;二是预防,就是预防出现与博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三是保护,也就是保护易受伤害人群和处在风险中的人群。

然而,当前公共健康视角下博彩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虽然危害最小化与责任博彩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然而许多文献并没有将两者有效地区分开来,有些甚至将两者互为替换;其次,从概念框架角度来说,该研究较为复杂;第三,不管是从危害最小化角度还是责任博彩角度而言,其实施的预防措施都缺乏有效验证。在许多指导和影响博彩政策决策的具体预防措施的有效性方面,我们发现它们明显缺少可信的研究数据;最后,该研究范式需要一个持续的、全方位系统的方法,如在进行博彩人群流行率调查时收集数据及跟踪调查难度较大,而且该方法在研究资金的筹集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有时难以维持。虽然该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与缺陷,但是它代表着未来博彩研究的一种趋势,这已在不同国家博彩研究的文献中有所体现。



注释

【注1】: 资料来源: [2008-07-26]. <http://sano.art.org/resource/harm.htm>.

【注2】: AGA 是美国博彩产业的一个协会组织。AGA 成立于1995年6月的华盛顿, 它创立的基本目标是希望通过教育和宣传, 提供一些博彩产业的实证数据给社会公众、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 使他们对博彩娱乐业有更好的理解。

【注3】: IPART 是新南威尔士州独立价格和管理审理委员会 (Independent Pricing and Regulatory Tribunal of New South Wales, 简称 IPART), 监督管理新南威尔士州水、电、天然气和公共交通业等的一个独立机构。1992年新南威尔士政府成立了该机构, 它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付给被政府机构垄断的服务部门和其他垄断行业的最高价格。从那以后, 该机构的责任范围逐年在扩大。

参考文献:

- [1] Korn, D. A., Gibbins, R., and Azmier, J.(2003). Framing public policy towards a public health paradigm for gambling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 235-256.
- [2] Korn, D. A. and Shaffer, H.(1999). Gambling and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Adopting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5: 289-365.
- [3] Messerlian, C., Derevensky, J., and Gupta, R.(2005). Youth gambling problems: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 69-79.
- [4] Korn, D. A. Examining gambling issues fro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OL]. eGambling, 2001, 4: 1-18 [2001-6-24]. <http://www.camh.net/egambling/issue4/feature/index.html>.
- [5]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Gambling Expansion in Canada: An Emerging Public Health Issue [EB/OL]. Canada: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0[2009-01-31]. <http://www.cpha.ca/english/policy/pstater/gambling/page1.htm>
- [6] Korn, D. A. Examining gambling issues fro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OL]. eGambling, 2001, 4: 1-18 [2001-6-24]. <http://www.camh.net/egambling/issue4/feature/index.html>.
- [7] Korn, D. A., Gibbins, R., and Azmier, J.(2003). Framing public policy towards a public health paradigm for gambling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 235-256.
- [8] Korn, D. A. and Shaffer, H.(1999). Gambling and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Adopting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5: 289-365.
- [9] Korn, D. A.(2000). Expansion of gambling in Canada: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social policy [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63(1): 61-64.
- [10] Korn, D. A. and Shaffer, H.(1999). Gambling and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Adopting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5: 289-365.
- [11] Korn, D.A. and Skinner, H.(2000). Gambling Expansion in Canada: An emerging public health issue [R].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0 Position Paper, Resolutions and Motions,
- [12] Blaszczynski, A. and Nower, L.(2002). A pathways model of 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J]. *Addiction*, 97(5): 487-499.
- [13] Marlatt, G.A.(1998). Harm Reduction: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High-Risk Behaviors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14] Hing, N.(1999). Responsible gambling in NSW clubs: perception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 8th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Melbourn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164-179.
- [15] Blaszczynski, A.(2001). Harm minimization strategies in gambling: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interventions [R]. Melbourne: Australian Gaming Council,
- [16] Schoemaker, P.J.(1979). The role of statistical knowledge in gambling decisions: Movement versus risk dimension approache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4: 1-17.
- [17] Gibson, B., Sanbonmatsu, D.M., and Posavac, S.S.(1997). The effects of selective hypothesis testing on gambling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3 (2): 126-142.
- [18] Ferland, F., Ladouceur, R., and Jacques, C.(2000). Evaluation of a gambling prevention program for youth [C]. Paper presented at 14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blem Gambling, Philadelphia, PA, October,
- [19] Steenbergh, T.A., Whelan, J.P, Meyers, A.W., May, R.K., and Floyd, K.(2004). Impact of warning and brief intervention messages on knowledge of gambling risk, irrational beliefs and behaviour [J].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4 (1): 3-16.
- [20] Floyd, K., Whelan, J. P., and Meyers, A.W.(2006). Use of warning messages to modify gambling beliefs and behaviour in a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 (1): 69-74.
- [21] Williams, R., and Connolly, D.(2006). Does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mathematics of gambling change gambling behaviour? [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 (1): 62-68.
- [22] Hing, N., Breen, H. and Buultjens.(2005). The responsible gambling code in Queensland: implementation and venue assessment [J]. *UNLV Gaming Research and Review*, 9 (1): 43-60.
- [23] McMillen, J. et al.(2000).Review of Regulatory Regimes for Australian Gambling [R].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Gambling Research,
- [24] Remmers, P.(2002). The Globalization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C]//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mbling & Risk-Taking. Vancouver:397-401.
- [25] Michalea, T.(2000). Problem gambling: Challenges of addressing a health issue [C]// Lessons of the past: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Conference. Mildur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120-128.
- [26] Dickerson. M. G.(1998). EGM players and responsible gambling [C]. In G. Coman (Ed.).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Practitioner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33-42.



提, 创新工作手段和方法。

4.2 完善和开发一批体育彩票种类

优化游戏产品结构, 形成以竞猜型为主体, 乐透型和即开型为支撑, 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游戏互为补充的产品体系。

发展竞猜型产品, 打造体育彩票品种的核心优势, 突出“竞彩”大品牌的主体地位, 丰富游戏规则, 逐步将竞猜对象由足球、篮球拓展至其他重大体育赛事; 优化乐透型产品结构, 打造大乐透、高频开奖游戏两个明星产品品牌, 并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中盘乐透型玩法; 保持即开型产品的领先地位, 确保市场竞争优势, 实施差异化市场投放策略, 拓展行业渠道, 创新营销宣传方式。

4.3 继续加强实体销售渠道建设

形成市、县、乡、村全覆盖的实体销售网络, 竞猜型产品销售网点、乐透型产品销售网点、即开型产品销售网点的数量和质量要满足体彩事业不断发展的需求, 并加强销售网点的标准化经营和专业化服务。探索发展销售大厅、自助终端等新型实体销售渠道, 开拓实体销售渠道的市场领域。

4.4 推进电话、互联网等非实体销售方式

在确保投注账户、资金账户、交易数据、对外合作、技术系统等安全可靠、职责明确的前提下, 实现电话、互联网非实体销售, 探索互动电话等销售方式。在不同的非实体

销售渠道下, 稳步推出新游戏, 拓广在线游戏市场空间, 满足中高收入人群购买体育彩票的需求。发挥非实体销售渠道成本低、覆盖面广的宣传优势, 通过提供高效、便捷、专业的服务, 扩大体育彩票的品牌影响力, 增加非实体销售渠道对体育彩票的市场贡献。

4.5 不断夯实体育彩票市场发展软实力

加强体彩文化建设, 提升体彩软实力。开展问题彩民救助、公益形象宣传, 弘扬体彩精神, 拓展文化传播渠道,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公益活动。

利用重大体育赛事资源, 结合体育彩票公益金在社会保障基金、残疾人事业等方面的突出贡献, 强化国家彩票的公益属性。完善彩民服务热线、问题彩民救助机制等, 培育理性的购彩文化, 更多地、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不断提升体育彩票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 [1] 李海. 体育博彩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刘文董, 许玲. 我国体育博彩发展状况研究[J]. 体育科研, 2010, (2)
- [3] 我国体育彩票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 [4] 2009年中国彩票年鉴[M]

(责任编辑: 陈建萍)

(上接第13页)

- [28] Hing, N. (2000). Changing fortun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blem gambling by New South Wales Registered Clubs [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Macarthur, Sydney.
- [29] Hing, N. (2003).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provision of gambling: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J]. *UNLV Gaming Research and Review Journal*, 7, (1): 33-47.
- [30] Doherty, K. (1999). Gambling industry codes of practice: A critical review. In J. McMillen & L. Laker (Eds.). *Developing strategic alliances: Proceedings of the 9th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Conference*. Australi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ambling Studies, 505-523.
- [31] Hing, N. (2000). Changing fortun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blem gambling by New South Wales Registered Clubs [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Macarthur, Sydney.
- [32] Hing, N. (2003).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provision of gambling: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J]. *UNLV Gaming Research and Review Journal*, 7, (1): 33-47.

(责任编辑: 陈建萍)